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建构的伦理反思

王银春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4;

吉首大学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湖南 吉首 427000)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建构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但也存在三大困境: 中国慈善精神滞后, 慈善本义形而上追问, 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破解当代中国慈善伦理面临的困境,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价值观体系, 需要积极扬弃中西方慈善伦理思想, 建构纯粹慈善理念观照下的多元慈善观; 实现传统慈善伦理思想现代转化, 培育公民慈善意识与慈善组织公信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慈善伦理思想时代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

【关键词】 慈善伦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 马克思主义慈善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1)09-0010-05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建构的现实价值

当前, 中国贫富差距拉大, 类似“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们俩一起出去买苹果, 你去买苹果4代, 我去买4袋苹果”的短信广为流传。一组来自国内媒体的数据如下: 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 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 基尼系数的警戒线是0.4,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 近两年又不断上升, 现在实际上已经突破了0.5; 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差距, 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电子、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的8%, 但收入占全国职工收入总额的55%。^[1]以上数据显示, 中国社会两级分化趋势已经凸显。为缩小贫富差距, 消除两极分化, 中国需要慈善事业,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伦理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伦理思想理论内涵丰富。其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伦理思想, 是我国新时期、新阶段产生的社会伦理思想, 是对传统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突破、创新、发展和完善。其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伦理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性质和内容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伦理思想从属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其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伦理思想, 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 为实现共同富裕, 为先富地区 and 个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伦理思想, 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谐思想, 它为消解我国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条途径, 为不同地区、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指明了一条道路。

当前,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意义重大。其一, 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随着社会阶层不断分化, 两级分化日益凸显, 社会矛盾日益激烈, 以市场和政府调节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 但尚未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为构建和谐社会, 需提倡第三种资源配置方式, 即发挥习惯与道德的力量对社会资源的调节作用, 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价值观, 发展慈善事业。其二, 有利于拓展社会功能, 协调社会阶层利益。世界发展趋势是“小政府, 大社会”, 政府将让渡越

来越多的职能给社会空间,基于伦理道德分配方式的慈善事业无疑也属于社会空间范畴。培育公民慈善意识,发展慈善事业是拓展社会功能、协调社会阶层利益的内生性现实诉求。其三,是顺应全球慈善趋势的必然选择。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了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慈善,如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艾滋病、危及全球的禽流感、突发性的自然灾害等。在人道主义无国界理念指导下,跨国界或地区的慈善机构和项目正蓬勃发展,如亚太慈善联合会、国际红十字会、欧洲基金会中心等,这些机构和项目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如中国在汶川特大地震救灾中就接受了大量国际援助。同时,中国民间积极支持境外灾难救援和重建,如援助海地地震、巴勒斯坦水灾等的救灾工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建构的伦理困境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诞生。近20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迅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价值观仍处于萌芽与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价值观体系正在形成与建构之中。当前,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主要面临三大困境。

困境一:中国慈善精神滞后。

2010年9月底,“巴比盛宴”在中国富豪中掀起了一场慈善风暴,富豪们“裸捐”者有之,“拒捐”者有之。有人将其称为“被慈善”的“鸿门宴”;有人认为慈善观可多元化,不必完全与巴菲特共舞;有人认为不论结果如何,慈善行为影响很重要。总之,美国式慈善遭遇了中国式尴尬。2010年10月23日,外媒公开宣称“中国慈善精神滞后”^[2]突出表现在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缺乏。2009年,中国个人捐赠总额为68.27万元,占境内捐赠总额的23.40%。与常年捐赠低于20%的情况相比,个人捐赠呈现上升势头。^[3]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约85%的慈善捐款来自普通

民众。年收入1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捐赠占收入的5.2%,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捐赠占收入的2.2%。^[4]在美国,慈善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数据显示,美国13岁以上人口中,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小时;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捐款1000多美元。^[5]

“中国慈善精神滞后”的决定因素主要有:其一,“爱有差等”的宗族伦理导致中国慈善文化先天不足。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法制度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爱有差等”的宗族伦理。因此,传统慈善从家族内的互助开始,是在“熟人圈”内展开的有局限的慈善。而现代语境的“慈善”,建立在“平等”、“博爱”的基础之上,是陌生人之间无偿自愿的救助。宗族伦理与现代慈善本质精神存在冲突矛盾,造成中国慈善文化先天不足。其二,“代际继承”的财富伦理导致中国慈善文化内驱力不够。因“爱有差等”,所以财富要留给后代,由子孙继承遗产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的主要功能除延续家族血脉之外,还包括对财产的继承和守护,否则就被视为“不孝”、“败家子”,“代际继承”的财富伦理致使慈善事业缺乏内在驱动力。其三,“仁政”的政治伦理造成民间慈善精神滞后。儒家文化的人世精神与“仁政”思想将救助社会弱势群体、赈灾看作政府施行“仁政”的表现。孔子曾制止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救贫,他说:“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廩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6]这表明政府才是社会福利主要甚至是唯一合法提供者,私人济贫行为是在影射政府无德,被看作政府失灵的表现,从而导致民间慈善精神不足。其四,宗教伦理缺失是中国慈善文化滞后的又一根源。基督教义中“原罪论”指导人们必须通过慈善接近上帝,才能在死后升入天堂。宗教信仰是教徒们慈善行为的主要思想来源,宗教团体是西方发展慈善事业的主推动力。虽然中国道教主张“为善无名”,佛教主张“止恶扬善”、修善积德,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先天具有非宗教传统倾向。与西方国家相比较

而言,中国慈善文化缺失了重要的宗教伦理资源。

困境二:慈善本义形而上追问。

做出慈善行为的动机是否纯粹,人们的慈善行为是否必须基于纯粹的慈善动机,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慈善事业是指基于公民自愿奉献的并通过非官方组织以非盈利性方式的钱物等扶助社会困难人群的公共事业。比如,张弓认为慈善是对“陌生人的伦理”;^[7]郑功成认为慈善是一种美德、善心和爱心,是人类最需要、最应当具备的基础性道德,其本质是人类善爱之心的表现和标志。^[8]Emily Silverman认为,“慈善不是损失尊严获得钱财和物资,与有限的社会供应不相抵触,是将现存可获得的资源传送给真正需要的人”,“金钱、物资和志愿者的劳动都应当流动起来,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保持慈善行为的循环”。^[9]有学者认为,慈善应更具包容性,为善无名的精神值得提倡,为善要名的积德行为也要认可。慈善理念应多元化,超越传统慈善伦理,无需过于追究慈善动机。慈善的本真意义是纯粹的,但不妨碍多元慈善观。

同时,对慈善本真意义的追问,必然会引发对“慈善需不需要感恩”的讨论。学术界和公众舆论对慈善是否需要感恩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慈善文化应该大于感恩文化。比如,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认为,要求感恩是对受助者尊严的伤害,不应强制受助者感恩。^[10]部分学者认为慈善需要感恩。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文化宣传部部长金重伦认为,慈善事业应是无偿的、宽容的,慈善救助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否则基于善心的慈善行为将变成一种道德绑架。^[11]也有研究者认为,感恩文化应该大于慈善文化。比如,刘美玲认为,资助者对受助者没有法律责任,只有伦理责任。基于此,受助者不能以自己权利的名义向资助者追究法律责任,而应对完成伦理责任的个人感恩。^[12]黄雁玲认为,感恩能够保障慈善事业持续发展,应塑造良性互动的感恩文化。^[13]张敏从河南慈善总会的“道德协议谈起”,主张实现感恩要诉诸制度,有必要在公正理念指导下,重点完善捐赠制度和建立感恩、激励、评价制度。^[14]

困境三: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

公信力指社会对一个组织的认可及信任程度,是为其使命而进行报告、解释、辩护和接受质询的责任,是社会公共生活中一个组织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对于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15]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西方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潮影响下,“重财富、轻伦理”观念一度成为社会主导思想,“贵利贱义”大行其道。这正如拉罗什福科所说:“德行消失在利益之中,正如江河流入海”,“财富能使我们的美德和恶性充分表露,就像光线显示出各种物体”。^[16]部分慈善组织“见利忘义”丑闻频发,如希望工程假信、青基会滥用善款等,其公信力遭到质疑,极大地挫伤了公众慈善捐赠的热情。据搜狐网对“造成中国慈善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在线调查数据显示,在1460名受调查者中,11.78%的人认为是“一部分有捐助能力的人没有尽到责任”;17.12%的人认为是“缺少鼓励进行慈善事业的机制环境”;1.99%的人选择了“其他”,而高达62.26%的人把“中国慈善机构的公益性令人怀疑”作为造成中国慈善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17]

慈善组织出现公信力危机,动员社会资源能力必然下降,必然限制慈善事业的健康良性发展。当前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根源在于筹款缺乏独立性,公民慈善责任意识处于培育过程中,民众捐款不是慈善组织筹资的主要来源等。其筹资主要来源于:一是政府财政拨款。这是中国特色的慈善组织形式,民间慈善成为政府慈善的延伸,缺乏独立性。慈善组织容易被公众认为是权力异化的产物。二是由于某些企业的大额捐款,造成慈善组织对企业资金的依赖,使其容易沦为企业的宣传工具。另外,中国慈善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不够,表现在:其一,慈善机构数量少,接受捐赠渠道不畅,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捐助活动的的能力较弱。其二,慈善组织专业水平较低,慈善宣传工作力度较弱,自律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其三,管理存在漏洞,致使侵占、挪用、贪污善款行为时有发生,饱受舆论诟病和民众非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建构的伦理思考

为破除当代中国慈善伦理面临的三大困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价值观体系,我们需要积极扬弃中西方慈善伦理思想,建构纯粹慈善理念观照下的多元慈善观;实现传统慈善伦理思想现代转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识与慈善组织公信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慈善伦理思想时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

1. 积极扬弃中西方慈善伦理思想,建构纯粹慈善理念观照下的多元慈善观

中西方慈善文化源远流长。自原始氏族社会开始,我国就有慈善螺寡孤独的传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体现了民间深厚的慈善情怀,是中国古代慈善的道德基础。西方是建立在上帝之爱基础上的广泛慈善。在基督教信仰的观照下,资产阶级竭尽全力积累财富。为接近上帝,整个社会具有发展慈善事业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导向。西方注重从人的本性中寻找自然法,这对西方人进行财富等经济问题研究影响重大,容易形成“增长财富观”。儒家礼制是专制制度、仪式和行为准则的统一体,家国利益凌驾于私有财产之上,容易形成“国富民弱”格局,同时儒家礼制具有政治重于经济倾向,容易形成“权贵资本”。西方认识论思维模式注重对财富本身及其性质的探究,形成了系统的财富增长与分配理论。中国的伦理学思维模式着力于对财富中人性、义利与外在关系研究,注重财富善恶的剖析,缺乏系统的财富增长与分配理论。中西方都有源远流长的慈善文化,但它们具有文化传统差异,中国财富形成中多为“权贵资本”,中国的捐赠是宣扬地慈善,西方捐赠是悄悄地慈善。为构建慈善伦理价值观体系,应积极扬弃中西方慈善伦理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包容多元的慈善观,在实践中无需过于追究慈善动机,建立更加适应中国国情的慈善观念。

2. 实现传统慈善伦理思想现代转化,培育公

民慈善意识与慈善组织公信力

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结构为熟人社会,形成了以血缘、族缘、乡缘、地缘为根基的文化认同意识,慈善是基于互助精神的熟人慈善。慈善事业的特点为族类性和民间性。而现代社会是公众社会或陌生人社会,现代慈善是“陌生人之间的伦理”。但无论是传统慈善还是现代慈善,同情和关爱弱势群体的基本精神不变。现代中国仍存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传统慈善伦理并未完全丧失其存在的文化根基,对传统慈善伦理应大力弘扬,同时需要现代转化,在理念上提升为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需超越“爱有差等”的宗族伦理,超越“代际继承”的财富伦理,超越“施仁政”的政治伦理,吸收西方宗教伦理纯粹慈善精神,倡导慈善本义,弘扬民间慈善。实践表明,在非典疫情、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赈灾中已体现了传统慈善伦理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其关键在于常态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其根本在于大力培育公众慈善意识,发展民间慈善组织,使慈善者和慈善形式多样化、民间化。另外,如果社会对慈善机构缺乏基本信任,会抑制人们的慈善意识,挫伤人们作出慈善行为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大力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首先,慈善组织要走专业化、职业化道路;其次,慈善活动运作过程中要增强行业自律,内外监督并行,做到善款善用;再次,要实行“阳光慈善”,善款来源与流向要透明,信息要公开。

3. 推进马克思主义慈善伦理思想时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

慈善事业古今中外都客观存在,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慈善是资产阶级的装饰品”,因而慈善受到大肆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慈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细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18]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的慈善实质是为了维持社会地位、赚取社会荣誉、扩大资本积累。列宁在《资产阶级慈善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文中也指出:“不是要鼓励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慈善家、当局和资产阶级身上,而是要把朦胧

的革命情绪变成明确的革命情绪；——要依靠群众的经验和他们的情绪，通过战前千百件的政治事实的启发——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证明，只有采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才是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19]毛泽东认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营垒中的办慈善不过是用“沽名钓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伪善。因此，慈善事业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当代中国国情出发，根本扭转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慈善事业的否定和批判，创造性地提出了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为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又说：“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21]他强调，先富的人和地区通过多种方式来帮助和扶持落后地区和个人实现共同富裕，其中包括慈善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2]作为经济社会变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需推进马克思主义慈善伦理思想时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其根本路径在于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慈善伦理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慈善伦理思想的时代化。

参考文献：

- [1]陈学明.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见：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年会文集（2010年度），第29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11.
- [2]Jessie Jiang.Amid China's Economic Booms, Philanthropy Lags.TIME, 2010,Saturday,Oct.23.
- [3]杨团.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3.
- [4][5]施昌奎.转型期慈善事业的运营管理模式[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1.
- [6]孔子家语，卷二[M].
- [7]张弓.慈善是对“陌生人的伦理”[N].宁波日报，2007-07-09.
- [8]郑功成等.中华慈善事业[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6.
- [9]Emily Silverman.Beyond Luck and Money Philanthropy can begin at home.The Bottom Line Managing Library Finances,2009,Vol.22,No.3,pp.93-94.
- [11]“道德协议”能走多远？[N].中国人大，2007-09-25.
- [12]刘美玲.感恩与责任：慈善事业的伦理困境解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 [13]黄雁玲.慈善与感恩：贫困大学生民间助学问题探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3).
- [14]张敏.实现感恩的制度诉求[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 [15]郝如一.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6.
- [16][法]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M].译者：许国政.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384.
- [17]孙铭浩等.关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问题的战略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1).
-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51.
- [19]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07-208.
- [20][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111.
- [2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8.